

对话濮存昕

正视生活中的庸俗 但心里要留点干净的地方

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张梦楠

演戏做人,《李白》之中有濮存昕的参悟。他说,原来总是激昂,现在得踏实下来去感受情境,于是,如今的《李白》已不是当年的《李白》。

他还主动提到了最近正火的“达康书记”吴刚,有人说,北京人艺的吴刚怎么演戏这么演,但在濮存昕看来,他在台上的时候,就是“敢”,接近于胡来。这是对的。

“在台上,一个演员可以没有一点遮盖,坦白自己的能力,这是演多少年才能摸到的道理。”濮存昕说,自己也快摸到这个道理了。

于是,他谈演戏与人生,便有了李白的通达与自由。



《李白》剧照

他·谈演戏

李白

他有最高境界的自由

钱报记者:人人心中都有李白,您心目中的李白是怎样的?

濮存昕(以下简称濮):就是自由性情,独立品格。这一定是所有文明的最高境界。

他的文采到达那个境界,张口就能来。他的诗能够世代流传,口头传送。他真的太接地气了,张嘴就来,非常自由。杜甫的平仄韵脚那么严谨,李白比不过杜甫,但杜甫说,我写不了李白这样的诗。他还是有性情。

钱报记者:您怎么理解他的诗?

濮:你说“床前明月光”多简单,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气,短短20个字,道透了人们这种情感,哀莫大于离愁。所有的痛苦和流泪,内心最流血的伤痛,都是离,和美好远离,和心里真善美的追求远离——丢东西了,把最在意的东西丢掉了。生命没了,好朋友要告别了。所有悲苦的唐诗宋词都是关于离愁。

像李清照不输于她同代的词人,写尽了离,说尽了愁(停顿,轻叹),李白就是人生苦短,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我自己现在就是好时候不多了,虽然说还行,我们演了200场,我能不能演到300场?

停顿

是因为“别演,别那么多情绪”

钱报记者:为什么现在演李白,敢“停”下来了?

濮:原来总是激昂。老是high C,现在我们踏实下来去感受情境。20年前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愤恨,愤怒出诗人的感觉。现在你的气场有了,你的停顿有道理,有内容,就多喘好几口气。在台上也不只是在演,而是像角色一样地生活。只要你感受是有艺术意愿的,汪洋恣肆干嘛干嘛,无为而如饴,那就对了。所以焦先生(北京人艺的创建人焦菊隐)说,要适当地遏制观众的期待。

有的时候觉得,艺术的技法形态就是和谐。对比都是对的:强弱动静虚实,明和暗,过程和停住。这种变化是一种和谐,在40岁以前绝对不懂。你在台上没必要动,一动都不许动。就像戏曲,像茅威涛讲的“干净极了”。话剧生活化——这还是彼得布鲁克说

的,他说现实主义话剧容易有两大毛病:拖、闷和琐碎。中国的戏曲就是高度的提炼,高度的写意。这个东西我是在林兆华那里练出来的。

钱报记者:林导怎么说?

濮:从《哈姆雷特》开始,他就说“别演,别那么多情绪”,到了《赵氏孤儿》,其实那个故事根本没有演一下,都是说出来的。5万块砖码在舞台上,下面是水槽,倾盆大雨下下来,水就顺着砖缝流走了。人在台上走,那个砖就会发出响声。你说这和剧情有关系吗?其实就是现代美术的一个空间。它用这种叙事编织起观众想象的宫廷政变的那些细节。

他·谈做人

官场

我真的是懂不了那个规矩

钱报记者:您虽然辞了副院长,但还是没离开它。

濮:我们离不开这个剧院,剧院再有问题,也离不开。如果说商业运作,跑码头,全国跑。老在生地方演,演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我在这儿呢,北京的真认你,你演戏他就买票,我们就踏踏实实的,认了这份亲事,就不离了。

钱报记者:你刚才说剧院的问题,是什么?

濮:人聚集不到一起来。真正最好的最有艺术状态的这个集体,气质在衰减。焦先生一个人是怎么通过几出戏把大家捏到一个审美的方向上来?英若诚、郑榕、黄宗洛、我父亲,但是焦先生在戏里给演员的空间大,他导演的艺术气质能够把所有的演员吸到这个空间来,各得其所,我们现在没有人了。

钱报记者:李白的进与退,和现在的你非常像。

濮:这都是后话,通过阅历慢慢积累,就是想做一个有自由性情、独立品格的人。

但在行政的系统中,在官场中,真的不可以。所以很多人说“你太不懂规矩了”。我真的是懂不了那个规矩,突然间就觉得我不应该是那样的。

钱报记者:那你是怎么样的?

濮:我是属蛇的,我应该是龙之亚,我是坐第二位的。我独当一面真不行,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。你提一些建议,怎么没人答应?然后就有电话来了,你昨天这个建议不行。

茅威涛羡慕我,说你怎么周游了十多年然后全身而退,谁都没有伤害?

我说,不是啊,我就认准了我得演戏,而且我真的能演戏。我一年一百来场,谁能像我这样?但演戏的时间一占,你就没时间去管别的事情。

所以,对剧院我也有愧悔之心,人家慢慢也了解,哎呀,濮哥不是那块料,所以也就原谅我了。

平庸生活

要给心里留一点干净点的地方

钱报记者:刚才您说了自由是什么,那独立呢?

濮:每个戏,都要把自己的性情摆进去,戏又都不一样,就像串糖葫芦的钎子,一定是你内部生命的素质。糖葫芦可以有山楂的,有山药的,有橘子的,每部戏都必须有自己真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最高的那几扇门,形没有,意有。

我演完《哈姆雷特》,人家说,真没想到小濮半年多没见,他能这么演戏!这句话传我耳朵里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夸奖。他们谁也没想到我这么干,在台上可以不讲道理,演戏可能经常有这种不讲道理的时候——林连昆老师有这个,台上激情四射,横着来。吴刚也是,他在电视里出这招,人家说,北京人艺一个叫吴刚的怎么演戏这么演?以前别人没见过。我们剧院很多演员是这样的。

钱报记者:吴刚老师一直是这样的吗?

濮:不是,吴刚他生活中慢慢悠悠、嘻嘻哈哈的,他才不显山不露水。他在这个剧院中也显不出份儿(北京话,最有范儿),比他份儿的人多了。但是他在台上,他敢。他演王进喜,说那西北话也不见得都对,但他就敢那么干。这是一个演员的力量。

钱报记者:您现在的苦恼是什么?

濮:时间不多啦。我没什么好苦恼的了,我心满意足了。这两天演《李白》最后结束的时候,就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圆满。跟自然一样,树叶落了,落花成泥,文人都有那么一点惆怅。但是,树叶自己惆怅吗?

人一定得懂得自然之道。这些东西在角色中,就是演一个人的欢欢喜喜,哪有对错。

郭启宏写了一个报国平天下,想为国家做一点贡献,但忍受不了官场倾轧的李白。那颗心不安静,浇上酒,出现了一个诗魂。拿他参照自己,然后我们得出一个中间值的答案:我们要有自由性情,独立品格,同时我们要正视生活中的庸俗,和生命中的沉重。该吃该喝该挣钱,但要给自己心里留一点干净点的地方。



下载“浙江24小时”读一读“李白书”